

重审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精神症候

——兼论当代文学的文化资源问题

贺仲明

【摘要】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商业文化潮流的抵抗姿态,但它在概念内涵、批评指向和讨论方法上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这局限了讨论的深度,影响其获得充分的社会效果。这种情况的造成,与刚刚过去的历史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戕害有直接关系,更深层的内在原因则是知识分子匮乏深厚的精神文化资源。事实上,文化资源匮乏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它严重制约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高度。如何以开放而多元的姿态对待优秀文化传统,深化自己的思想文化内涵,是当代中国作家和学者很重要的课题,也是创作出真正创造性思想和作品的前提。

【关键词】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当代文学;文化资源

【作者简介】贺仲明,暨南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当代文坛》(成都),2023.1.57~6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DZA273。

回顾从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①以来的近30年中国社会,可以清晰地看到商业文化逐渐主导中国文化的过程。如果说在1990年代,还有人在争论“人文精神”和金钱的价值孰高孰低,2000年代,不少人还在“没有爱情的宝马轿车”和“有爱情的自行车”之间犹疑、权衡的话,那么在今天,人们关心的已经只是最快获得金钱的方式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人们很自然会关注和反顾那些曾经有过的抗击商业文化的声音。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也就浮出水面,成为让人反复讨论的事件。^②确实,30年间,它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商业化过程中发出的唯一的集体声音。基于人们对这一讨论的反思已经涉及多个方面,本文内容只针对它的精神内涵问题。

一

“人文精神讨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毫无疑问,它存在着比较重要的缺陷。在30年过后的今天,这些缺陷呈现得更为充分,主体精神方面应该是它

最重要的症候。具体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其一,精神内涵不清晰。

任何讨论,概念内涵的清晰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只有思路清晰、方向明确的概念内涵,才能让讨论具备基本的目标,讨论者能够在同一思想层面上进行对话,从而形成明晰的(尽管可能是多样的)思想方向,影响或启迪读者,在时代文化中产生自己的作用。这当然不是要将“人文精神”的内涵简单化,但无论如何,基本内涵、价值方向的一致是保证讨论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否则,讨论者虽运用同一词语,但各有含义,就不可能将讨论深入,更遑言取得某些共识。

然而,正如有批评者所说:“不难看出,对于‘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学者们的解释五花八门,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概念。”^③审视整个讨论,大家虽然都使用“人文精神”这一概念,但不同人的概念内涵却有相当大的差别,甚至存在有实质上的对立。《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综述》一文对讨

论中不同学者对“人文精神”概念界定做了细致的梳理,^④从中可以看出,概念内涵有很丰富的指向:有西方近现代的人文精神,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还有基本指向现实政治的“理想”“信仰”等。概念的差异,代表的是讨论者完全没有形成基本相同的思想立场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虽然不少讨论者表面上都是在呼吁、倡导“人文精神”,但实际上,每个人的意图指向却不相一致,甚至可能南辕北辙。这样的讨论也很容易受到批评者的争议。比如,当一些学者提出“重建”或“回归”人文精神时,就有人质疑、针砭其内涵:“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状态呢?如日中天么?引领风骚么?成为传统或者‘主流’么?盛极而衰么?”^⑤“如果说是失落了革命传统,或者以儒家教义为基础的传统道德,人们很容易明白。”^⑥

其二,精神指向不明确。

“人文精神”讨论是从批判和否定开始的。正是因为对现实文化中的某些现象不满意,才有这一讨论的产生。批判的目标有比较具体的(如王朔、王蒙、张艺谋等),也有相对抽象、概括性的。从表面看,批判对象似乎比较清晰,但实际上,讨论并没有真正准确地将目标指向所意图否定的对象。或者准确地说,它有直接而表面的目标,但却没有抓住真正要针砭的实质对象。

讨论指向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时代文化的认识。1990年代初期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态。商业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迅速发展,所以,“人文精神”讨论的否定对象也主要针对它。这似乎是明确的,但关键是,文化情况并非如此鲜明。简单说,当时社会主要存在政治和商业两种文化。二者密切关联,但呈现的是复杂交织乃至交错的状态,其内涵也很复杂。比如时代政治文化是一种新的、以开放为主体精神的文化,它刺激了经济发展,客观上推进了商业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富有创新性,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起了重要的解放作用。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它理解为商业文化的发展背

景,无疑是非常片面的认识。

二是对“物质”(商业文化)和“精神”(人文精神)之间关系的认识。人类生存离不开物质和精神这两个要素。但它们不是绝对分离,而是密切交叉的。换句话说,物质是人生存的基础,物质的解放也是人的解放,包含着人正常而基本的欲望要求。离开必要的物质基础来谈“精神”,只能是空洞和虚假的。所以,我们既需要认可物质在生存中的必要价值,又不做物质的奴仆,批判唯物质的商业文化。对“人文精神”的倡导,应该建立在包含着物质和精神、理性和感性不同层面的完整的“人”的全面理解上,特别是既不完全否定物质的价值,又突出精神更高的意义。如此才能为当时迷茫于物质和精神选择间的普通大众提供思想的启迪,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商业文化潮流。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文精神”讨论,其认识上的误区是明显的,批判对象也存着一定的偏离。比如讨论的主要批判对象王朔。王朔的文学作品具有对“崇高”“理想”等文化调侃和讽刺的内容,也对物质文化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因此获得社会大众较多的认可。不可否认,王朔作品确实存着有彻底亵渎理想、精神的缺陷,但它同时也针砭了长期流行的虚假“理想主义”,其对物质的肯定也并没有完全陷入商业文化的陷阱中。因此,如果只看到王朔作品的负面特点而忽略其积极意义,特别是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些作品为什么会受到大众广泛的欢迎,显然是相当片面化和简单化的。^⑦同样,在讨论中也遭遇批评的张艺谋等人所谓的“暴露黑暗”“技术化”等问题,更存在着观念陈旧和忽视大众权利的缺陷——任何艺术都有自律的内在要求,也有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目的,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否定。

其三,精神表达方式过于简单化。

作为讨论,特别是以“人文精神”为中心的讨论,思想的宽容和态度的恳切应该是引导讨论深入的重要前提。然而,讨论的实际表现却没有如此。无论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还是质疑者,都普遍缺乏平和理性的态度,充斥着简单化和情绪化的意气之

争。这导致很多问题被情绪所遮蔽,无法进行深入辨析。此外,在讨论方式上还存在着空洞抽象的缺点。“人文精神讨论”是针对现实问题的讨论,但很少有讨论者真正深入结合现实问题,特别是没有体察大众的生存匮乏,将社会大众问题作为个案进行深入讨论,并针对性地对问题进行剖析和探究。

如此多方面的精神缺失,严重限制了“人文精神讨论”的效果。讨论虽然参与者众,时间持续也不短,但它没有对社会大众文化产生一定影响力,而是基本上局限在知识分子范围之内。换言之,讨论没有为社会大众提供有效的思想力量,没有在商业文化无所顾忌的侵袭中产生基本的阻挡作用。而且,因为缺乏清晰性和系统性,讨论的成果也无法作为重要的精神遗产为后来者所借用。这严重局限了它作为一个重要时代性文化事件的意义。

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它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重建社会文化信任的机会。漫长的前几十年是对知识分子化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精神沦落的过程。人们已经丧失了对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好印象,知识分子自身形象和品格也亟待重建。“人文精神讨论”表现出这一愿望,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如果讨论真能起到影响社会文化、启迪大众的作用,知识分子也许会获得不同的社会声誉和形象面貌,自身的价值建设也可能更有收获。然而,讨论的失败,知识分子承受的是社会 and 自我的双重打击。今天社会知识分子形象千疮百孔,屡屡成为嘲讽和否定的对象,根本原因当然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行为,“人文精神讨论”是其表征,也是某种起始。

二

当然,我之所以在今天来讨论“人文精神讨论”的问题,绝非依靠后来者的时间优势,对历史进行简单的菲薄和指点。而且,我也完全不否认这一讨论存在的意义。正如“人文精神讨论”主要发起者之一的王晓明在后来对讨论起因的总结:“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消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

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⑧毫无疑问,在当时背景下,“人物介绍讨论”是有充分价值的。参与讨论的知识分子也大多具有较深的人文情怀。他们对现实文化的深切忧虑和对自我的文化持守,都赋予了讨论一定的悲壮色彩。

更重要的是,检讨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现实。如前所述,今天中国社会深受商业文化的侵蚀,精神文化问题正严重困扰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以,我在这里与其说是反思历史,不如说更是针砭现实;既是针对他人,也在解剖自己。也正从此目的出发,我认为检讨“人文精神讨论”,一项重要工作是探讨其失败的原因。只有找到根源所在,努力改变和完善,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在我看来,有两个因素对讨论产生了最大的负面影响:

最外在、也最突出的,应该是刚刚过去的政治历史。讨论进行时,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但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社会还没有进行真正深刻和全面的反思。也正因为如此,这段历史对社会的影响力长期而深刻地存在,包括到今天社会。由于“人文精神讨论”主要参与者为知识分子,这里就重点谈这一历史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影响,以及在讨论中的具体体现。

最突出的是知识分子缺乏现代思想意识,包括缺乏自我批判和独立意识。很多学者都指出过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强烈的权力依附弱点,事实上,这一弱点远没有随着封建时代的终结而消逝。刚过去的历史充分体现出这一点。“人文精神讨论”中,一些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忽视和脱离现实以及不自觉的政治皈依意识,都可以看到长期以来形成的虚假中心意识的影响。如果能够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讨论应该会有不同的发展。其次,在思想特点上也可以看出历史的影响。比如,如林毓生所指出的,以“文化解决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弱点,其背后隐藏的是缺乏现实关注意识,以及结合现实来思考问题的能力。^⑨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决定论”观念的影响。讨论充斥

各种文化概念,却未能切实联系现实大众的生存状况和精神欲求,空洞“理想主义”文化的影响很明显。第三,讨论方式上也可以看到历史带来的影响。相当一段时间中,社会文化盛行二元对立思维。它很容易造成人们认识事物的狭窄和绝对化,以缺乏宽容和极端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人文精神”讨论中最典型的表现是一些读者来信。“列举了当时一系列文化界的名流,要求参与者逐一批倒批臭,‘定点清除’”。“对张艺谋‘利用电影给祖国抹黑’的‘无耻行径’,进行了‘字字血声声泪’式的控诉”。^⑩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留下的语言和思维暴力特征。相比之下,像施蛰存、郑敏、王蒙等经历过较多历史风雨洗礼的老作家,受历史文化影响就相对较小,在讨论中也能够保持相对宽容、平和的态度。^⑪

历史对“讨论”有严重的制约,而更根本和更内在的原因则是思想资源的匮乏。检讨“讨论”全过程,无论内涵、视野还是方法,它们都关联着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和精神品格。这一匮乏,根源于知识分子的深层文化资源。

对于刚刚从相当长时间的文化封闭中走出来的中国社会来说,面对1990年代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文化潮流,要准确地把握和认识,特别是针对社会现实做出准确的判断,绝非易事。在当时背景下,它没有旧的传统可以依靠,时代最需要的,是新的建设,是独立的、全新的思考。这一建设的根本,就是真正的“现代”“人文精神”。也就是说,它应该包括两个基本内涵:现代思想意识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现代性思想的意义无可置疑——商业文化本是现代工业文明伴生的产物,只有现代性思想,才能建立起现代人文意识,准确辨析商业文化的合理性以及危害,才能对现实做出正确的判断。但同时,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也非常重要。因为从社会文化来说,经历过长时间的文化激荡,人们内心文化已经非常空洞和匮乏,精神信仰出现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商业文化很容易对他们构成侵蚀和统治。中国传统以伦理为中心的人文精神,是大众内心最深

层的文化,也是真正能够针砭时弊、对商业文化潮流产生有效抵制作用的思想。这两种文化思想需要创新性的融合,需要内在的统一。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现代西方文化思想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思想资源。它们是共同应对汹涌商业文化潮流的思想武器。

由此来说,“人文精神讨论”需要的文化资源不只是传统与现代的哪一方面,而应该是二者的融合。我的理解,主要内容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更新。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民族文化是独特、深刻思想的最重要源泉。特别是传统文化认识世界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以及哲学层面的中国文化观念和艺术精神——它是中国古代思想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精髓之所在,是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根本,也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创造性之源;其二,对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更新和改造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绝对不可能墨守成规、亦步亦趋,而是需要以宽阔的胸怀学习、借鉴和吸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先进的现代文化,丰富和完善自己。

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传统和开放学习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它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方面,只有开放的视野,借助外在文化的对比和观照,才能拥有对自我准确的认知力和批判力,做到去芜存菁,进行合理的选择和扬弃。反过来说,只有保有基本的传统内涵,才能谈借鉴和吸收,否则就是失去自我,是主体的丧失乃至消亡——放弃自我也就谈不上接受,而只能是投靠。

三

在当时环境下,以上对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要求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或者说,这里所表达的不是一种现实要求,而是一种理想和期待。所以,这种期待对于“人文精神讨论”本身也许没有实际意义,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却很重要。因为精神资源问题不只是“人文精神讨论”进行的1990年代问题,也是困扰当前文学的重要问题。换言之,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意义,深刻关系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

毫无疑问,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但有两个方面制约着它的高度。一是缺乏真正超越性思想和创造性艺术的优秀作家作品。当代文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与现实关系密切,作家们关注现实、书写现实也思考现实。但是作家们的思考多局限于现实本身,缺乏超越现实层面的抽象性文化思考,更匮乏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予以创造性呈现的思想和艺术佳作。其结果是我们在当代文学中几乎看不到真正超越于一般社会大众之上的、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也看不到具有真正独立哲学高度的优秀作家,也缺少真正具有民族个性的艺术特征和创造性的审美方法。所以,当代文学中达到经典高度的作品还很少,更缺乏像鲁迅那样思想深邃而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家。二是缺少鲜明而独特的文学特点,呈现出“中国文学”的整体文学个性。与作家创作上的创造性匮乏相似,当代文学思想也基本上都是尾随于西方理论话语之后,严重缺乏独特性和原创性。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呈现出清晰的独特个性,形成鲜明的面貌特征。一个常识性道理,一个作家要显示出较高价值,必须要具有自己的独特创造性,思想或风格上的与众不同。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只有在与其它民族文学比较,它表现出了认识世界方式或表现世界审美特征上的独特个性,才能赢得世界文学的充分尊重,呈现出自己的独特价值。就目前看,虽然个别作家作品具有一定的创作个性,但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不够,也没有为世界文学奉献出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学”形象。从在世界文学的地位和影响力角度说,当代文学远不能与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学相比。

当代文学这两大症结,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最根本的原因也许在于其精神资源。没有深刻的文化为精神后盾,局限了当代中国文学无法产生超越性的思想和独特的艺术个性,也限制了它获得更高的成就。

现实往往由历史所造就。显然,检讨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历史非常有必要。中国当代文学前30年基本沿袭“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方向。其主体是从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现代性为寄初。这是一种必然也合理的趋势。然而其中也存在着一些较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对民族文化相当严重的淡漠和忽视。虽然现代文化也倡导对民族文化的“扬弃”立场,但在缺乏开放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更由于对服务现实的强调,实际上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非常简单和片面。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历史阶段中,对民族文化更是采取强烈否定和打击的方式。长此以往,结果是普通大众对民族文化非常隔膜,心理上对立,缺乏对它的接受和认识能力。表现在文学方面,就是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也匮乏对民族传统文化尊重、借鉴、继承和发展的自觉。

1980年代后,社会文化进入开放时代,人们拥有了更开阔的文化视野。然而,社会文化态度和作家文化资源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们意识到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差距,没有意识到差距形成的复杂原因,而是简单归咎于民族文化问题。于是,社会排斥民族文化之风没有断绝,而是更广泛地发展。作家们也是几乎全力倾向西方,试图以西方文学和文化为自己的创作资源,对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极少热情和兴趣。作家宁肯曾经这样概括中国作家的文化资源现状:“中国当下写作的根源似乎都在西方,我们顺口就能说出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却唯独对中国自己的文学传统处于失语状态。”^⑩这一概括丝毫不夸张。对作家们的开放和学习姿态应该充分肯定,但对其方法却需要有深刻反思。完全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向外学习,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可能获得成功。因为任何文化都由长期积淀而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复杂文化关联。要想在异文化背景下进入西方文化,依靠其作为文学创作的独特思想源泉,显然不太可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民族文化环境中成长,潜移默化受到本民族文化影响,影响很深。长大以后,这种影响依然很深。在外在思想层面改变相对较容易,内在哲学思想改变却很难。当作家文学创作时,哲学世界观是根本而内在的。要换一种哲学思想来思想、创作,难度很大。所以,一个中国作家要完全吸取西方

文化传统,以之为自己的深厚创作资源是难以做到的。最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既没有真正学习到西方文化,也失去了自我文化传统,最终陷入到中不西的浮萍般困境之中。

以上对当代文学历史的检讨,可以看出,虽然不同时期的文化背景和潮流方向存在差别,但却共同承担着传统匮乏的后果。那就是不能深入地认识传统,对传统进行辨析、改造和转化,与现代思想进行融汇和发展,产生既具有现实性又富有创新性的思想和作品。即使是个别作家拥有依靠传统的自觉,也没有能力承担起这样的重任。从心理层面看,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作家们对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自信——或者准确地说,是对传统文学现代生命力的自信。

以两个个案来作为不同方向的典型。一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当代命运。这一由废名、沈从文等人开拓,萧红、师陀、汪曾祺等人继承和发展的小说传统,既借用现代小说形式,又化用传统文学艺术特征,更将儒家和道家思想与现代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是具有很强创新潜力的优秀传统。然而,在当代文学中,这一创作却是日益萎缩。特别是在1990年代后,它已经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作品,意味着这一传统的基本中断。究其根本,就是当代作家的传统文学和文化底蕴太薄弱,没有能力继承这一创作传统、维系其生命力。二是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长期历史所导致的思想狭窄和艺术匮乏背景下,这一创作自有其不可否定的历史意义。但从其创作本身看,价值成就确实有限。它的艺术表现固然完全是模仿西方,没有独创性。它的思想内涵也大多空洞虚幻,基本上是西方观念的表层体现。所以,它既没有融入现实,也没有被大众所接受。它只具有文学史意义,却匮乏文学本身的意义。

从精神层面则仍然回到“人文精神讨论”。由于缺乏深广的文化资源,就难以拥有独立而坚定的主体精神和文化立场。“人文精神讨论”中,不少讨论者最终都选择了以“回归”为基本的思想目标。如张炜回归以农业文明为中心的“田园”,张承志回归宗教以拒绝现实……作为文学来说,这种回归并非没有

意义,但作为知识分子文化来说,它毫无疑问是一种现代力量匮乏的表现,背后蕴含着内在的软弱和犹疑。如果结合“人文精神讨论”过后近30年间知识分子的表现看更是如此:在这当中,知识分子没有表现出其充分的社会批判精神,一些人选择了与主流文化的合流,乃至推波助澜;一些人选择“躲进小楼成一统”,规避与现实的对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主体自信匮乏的表征,也是文化资源匮乏的结果。

注释:

①“人文精神讨论”其实没有明确的范围。宽泛来说,它指的是1990年代中叶以“人文精神”为主题的相关讨论,主要包括1993年《上海文学》发起、《读书》《东方》等杂志参与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讨论,以及以王朔、王蒙“躲避崇高”为中心的讨论,以张承志、张炜“道德理想主义”为中心的讨论。参见李建周《王朔与“人文精神讨论”》,《当代文坛》2022年第3期。

②近年来,对这一讨论的总结文章甚众,其中有当事人的自我回顾,更多后来人的检讨和反思。

③杨蓉蓉:《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反思》,《兰州学刊》2005年第5期。

④文理平:《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综述》(上),《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3期。

⑤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1994年第5期。

⑥王蒙:《沪上思絮录》,《上海文学》1995年第1期。

⑦这一点,王蒙当年做出了相当细致的辨析,但没有得到讨论者的充分认可,反而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参见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⑧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⑨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⑩《二十年前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否还记得?》,天涯微信号 tyzzz01,2017年3月29日。

⑪参见李丹、吴俊:《文学商品化与“人文精神讨论”的代际反应差异——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现象观察》,《当代文坛》2020年第2期。

⑫傅小平:《中国为何缺少“作家中的作家”?》,《文学报》2014年9月4日。